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店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与民主

〔美〕约瑟夫·熊彼特 著



0102077 F091.354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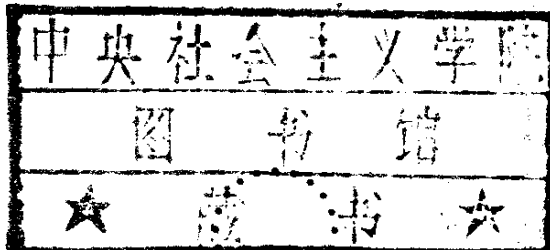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DH06/01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与民主

[美] 约瑟夫·熊彼特 著

吴良健 译



201020778

商务印书馆

1999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1997年先后分七辑印行了名著三百种。现继续编印第八辑。到1998年底出版至340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8年3月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评熊彼特的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一)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 1883—1950年), 美籍奥地利人, 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是熊彼特的主要代表作之一, 它综合地表述了熊彼特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方面的思想观点。

熊彼特于 1883 年出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Moravia, 今捷克境内)特利希镇(Triesch)的一个织布厂主家庭。他幼年就学于维也纳的一个贵族中学; 1901—1906 年肄业于维也纳大学, 攻读法律和经济, 是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 - Bawerk)和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的及门弟子。当时他的同学好友中有后来成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物的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 以及后来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第二国际首领之一的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等人。随后两年, 熊彼特游学伦敦, 向新古典学派大师马歇尔登门求教。他还推崇洛桑学派瓦尔拉等人。1909—1918 年, 他先后在奥匈帝国的捷尔诺维兹(Czernowitz)大学和格拉兹(Graz)大学任教授, 中途曾以互换教授名义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短期讲学, 并获得该校名誉博士学位。1918 年, 他以党外“经济专家”身份, 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化委员会”

(Sozialisierungs-Kommission)的顾问,该委员会的领导人是考茨基、希法亭等。1919年2月,由于奥托·鲍威尔的推荐,熊彼特被任命为奥地利共和国的由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组成的混合内阁的财政部长;是年10月,因亲英、法并反对工业国有化等等,与社会民主党人意见不合而去职。1921年他任维也纳私营皮达曼银行总经理,1924年银行破产。1925—1932年,他又从官场仕途回到资产阶级学术界,先应邀赴日本任客座教授,不久任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教授。1932年因受聘哈佛大学而迁居美国,从那时到1950年1月逝世,一直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1937—1941年,他担任“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48年起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49年,当代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筹设“国际经济学会”,曾一致同意将来由熊彼特担任第一届会长。

作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熊彼特在他的一生中撰写了许多专著和论文。他的主要代表作,除本书外,还有三本大部头专著:《经济发展理论》,1912年以德文出版,1934年译成英文,还译成了意、法、日文和西班牙文;《商业循环: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1939年出版(两卷);《经济分析史》,生前未完成,1954年由他的夫人伊丽莎白编辑出版。这三本书中,除《商业循环》至今尚无中译本外,《经济发展理论》和《经济分析史》近年均已译成中文,并于1987年和1988年分别由笔者作序,由商务印书馆于1990年和1991年先后出版。

从熊彼特的出身、学历、工作经历和著作来看,我们可以明了,熊彼特一方面直接承袭了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大师庞巴维克、瓦尔拉、马歇尔等人的理论;另一方面又与早期社会党人有过密切的

关系。这些是我们了解熊彼特的哲学观点、政治见解和经济学说渊源的重要依据。前一方面的渊源,决定了熊彼特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真传嫡系,使他在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占有重要席位;后一方面的渊源,又使熊彼特的学说和主张带有一些社会主义色彩,以致有人把他看作是“社会主义者”。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于1942年在纽约和伦敦出版,是熊彼特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著作。据他在第一版序言中宣称,这部著作“是把几乎40年来我对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的大量思考、观察和研究写成一本易读读物的努力的结果”。全书分为五篇:《马克思的学说》,《资本主义能存在下去吗?》,《社会主义行得通吗?》,《社会主义与民主》,《各社会主义政党史略》。1947年的第二版增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一章;1950年的第三版又增加了著者逝世前不久(1949年12月)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提出的一篇演讲论文:《大步进入社会主义》。此书出版后,曾受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的热烈赞扬,但同时也遭到有些资产阶级学者的反对。几乎和著者的另一代表作《经济发展理论》一样,被译成多种文字,1946年译成了德文和西班牙文出版,著者逝世后又译成了法、意、日文出版。正由于此书适应着当代资产阶级的需要,所以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界曾广为流行。现在,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出版,供我国学术界研究评论之用,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二)

本书第一篇,熊彼特以“马克思的学说”为标题,分为四章,连续撰述了“先知马克思”、“社会学家马克思”、“经济学家马克思”、

“导师马克思”。在文中，尽管熊彼特在不少地方对马克思的学说表示了不赞成或反对，但总的说来，他对马克思及其学说是非常推崇的。他在本篇开头的“前言”里写道：“大多数智力或想像力的创作，经过短的不过饭后一小时，长的达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就永远消失了。但有一些创作却不这样。它们遭受几度隐没，复又重现，它们不是作为文化遗产中不可辨认的成份而重现，而是穿着自己的服装，带着人们能看到的、摸到的自己的瘢痕而重现。这些创作，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伟大的创作——这个把伟大与生命力联结一起的称谓不会不恰当。从这个意义上说，无疑这伟大一词适合马克思的理论”。这里，熊彼特显然称颂马克思的学说是伟大的。

本篇“马克思的学说”，后来收入熊彼特的遗作《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一书中。该书由熊彼特夫人（伊丽莎白·熊彼特，亦为经济学家）于1951年，根据作者生前从1910到1950年1月所写的传记和评论文章，加以编辑或从德文转译而成，1952年以英文出版。中译本已于196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为此，本文对这一部分不拟详加评述，而只就其经济理论方面稍予讨论。

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以“创新理论”为根据，提出了“资本主义将活不下去”，并且将自动进入“社会主义”的“过渡”理论。

熊彼特一方面大力推崇马克思是学识渊博、智慧超越、钻研精深的经济理论家，另一方面又反对从李嘉图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熊彼特提出两条反对“劳动价值论”的理由：“首先，在完全竞争以外的情况下，它完全不起作用。其次，即使在完全竞争的情

况下,除非劳动是生产的唯一要素和所有劳动都是同一性质,否则它决不会顺利地起作用”(本书第70页)。基于这种理由,熊彼特认为“边际效用价值论”在许多方面要“优越于”劳动价值论,因为边际效用价值“一方面适用于垄断和不完全竞争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同样适用于存在其他要素和存在许多不同种类、不同性质劳动的情况”。我们认为,熊彼特在这里提出的论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首先,他所提出的反对劳动价值论的“两点理由”并不能成立;因为如果把“假设条件与实际情况之间存在重大矛盾”这一点作为反对理由,那这也同样适用于“边际效用价值论”。其次,更加重要的关键的一点倒是在于:所谓“边际效用价值论”只是一种以主观评价作为基础的主观价值论;而“边际效用”作为一种生活现象虽然存在,但各个消费者千差万别,变动无常,要把它作为最终形成价值和衡量价值的客观依据,不论是“基数”效用论,还是“序数”效用论,那都是不可能的。

以上是就价值论而言的。就分配论来说,这里值得提到的是在利息学说上熊彼特和他的恩师庞巴维克的有名的争论。我们知道,庞巴维克是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和他的弟子们在价值论上都是信奉边际效用论的;但在分配论上师徒之间并不一致。当年庞巴维克以倡导“时差利息论”而名闻经济学界。他认为人们对“现在财货”的评价通常大于对“未来财货”的评价,这种由于对“现在”和对“未来”评价之不同而带来的价值上差异,就是“时差”。时差的存在,要求未来财货所有者必须对现在财货所有者支付“补偿”或“贴水”,这就是“利息”。按照此说,利息来源于时差,与劳动无关。

熊彼特则不赞成老师的“时差利息论”，而提出独树一帜的“创新利润、利息论”。关于“利息”的形成，熊彼特早年就在其成名之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三大要点：^① 第一，利息实质上来自“剩余价值”或“余额价值”(the surplus values)。在正常的经济生活里，除了上述“余额”或“剩余”，如前所述，乃来自“创新”引起的“经济发展”。因此，在“循环流转”的情况下，也就是在没有“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就不会有利息。第二，“发展”带来的“余额”或“剩余”价值，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家利润；一类是同“发展”本身相联系的结果。显然，利息不能来自后者，因此，利息只有来自也必须来自企业家利润。利息便是从这种报酬中支付的，如同对利润的一种“课税”。第三，在一种通行“交换经济”也就是“商品经济”的社会里，利息不是暂时的，而是一种永久现象。

从这一有名争论中，我们可以认识到两点：其一，庞巴维克认为利息来源于“时差”，与劳动无关，更与对劳动的剥削无关。熊彼特认为利息来自利润，最终来自“创新”。两人都不赞成马克思的利息学说，认为正常的利息不是剥削收入。其二，熊彼特在利息学说方面，和乃师庞巴维克争辩达十数年之久，最后仍然是各执己见，并不服从对方。这种师徒之间相互尊重、平等待人的争论精神，是值得今天我们学术界大为提倡的。

(三)

从本书第二篇到第四篇，熊彼特提出了并且回答和解释了三

^① 参阅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英文本，哈佛大学出版社1936年版，第5章“资本的利息”，第173—175页。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75—177页。

个命题：

第一，“资本主义能存在下去吗？”熊彼特回答说：“不，我不认为它能存在下去”（本书第 119 页）。

第二，“社会主义能行得通吗？”熊彼特回答说：“当然行得通”（本书第 257 页）。

第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如何？”熊彼特回答说：“在我们所界说的社会主义和我们所界说的民主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两者之中任何一个都能够没有另一个而存在”（本书第 414 页）。

现在我们就来简要地剖析一番，看看熊彼特对这三个命题的答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第一个命题：关于“资本主义能不能存在下去”的问题。

熊彼特说“资本主义不能存在下去”。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呢？这种“资本主义”又为什么“不能活下去”呢？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变动的形式或方法，它不仅从来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本书第 146 页）。他说：“开动和保持资本主义发动机运动的根本推动力，来自资本主义企业创造的新消费品、新生产方法或运输方法、新市场、新产业组织的新形式”（本书第 146 页）。他借用生物学上的术语，把那种所谓“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的这种过程，称作“产业突变”（Industrial Mutation）；并说“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Process of Creative Destruction），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本书第 147 页）。他还比喻说，在建立理论体系时，如果忽视了资本主义的这种本质要素，也会“像没有丹麦王子的《哈姆雷特》”（本书第 150 页）。很清

楚,熊彼特所说的“资本主义”,乃是生产力变革或技术变革的一种形式或方法,他所谓的作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因素”的“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或“产业突变”,也只是生产技术的变革过程。在熊彼特的分析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完全看不到了,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实质也完全被掩盖了。如果要用上述比喻的话,这些被他掩盖起来的东 西,倒真正是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中的丹麦王子。

关于“资本主义之所以活不下去”,熊彼特认为这是由于企业家的“创新职能”日弱,“投资机会”日渐消失所致。他说,像前面所提到的“企业家”的“这种社会职能的重要性正在丧失,……其重要性必定还会加速丧失……革新本身已降为日常事务了”(本书第 211 页)。“经济进步日趋于与个人无关和自动化。机关和委员会的工作日渐取代个人的活动”(本书第 211 页)。“此时将出现或多或少的静止的状态。本质上属于一个进化过程的资本主义就会萎缩衰退。此时,企业家将无事可做。……利润以及与利润亦步亦趋的利率都会趋向于零。靠利润和利息为生的资产者阶层将趋于消失。……一种非常清醒型的社会主义将几乎自动地出现”(本书第 209—210 页)。最后熊彼特归结说:“如果资本主义的进化——‘进步’——停止了,或者变得完全自动化了,那么,产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最后将降为付给日常行政工作的工资。因为资本主义企业由于它本身的成就使它的进步自动化,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它倾向于使自己变得多余——它会被自己的成就压得粉碎。……而且到最后它还会撵走企业家,剥夺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真正开路人不 是宣扬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和煽动家,而是范德比尔特、卡内基和洛克菲勒这类人”(本书

第 213—214 页)。

这就是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不能活下去”的分析和说明。他的这种论点,是以他在 1912 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特别是其中的“创新学说”,为其理论基础的。他的“资本主义”和“企业家”,是以不断“革新生产技术”、不断进行“创造性的破坏”为其本质特征和基本职能的。按照他的说法,一旦“经济进步”使一切都“自动化”了,无需“人的作用”了,“投资机会”也就没有了,“企业家”也就用不着了,“资本主义”也就活不下去,而将“自动地”进入“社会主义”。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笔下,当代垄断资产阶级集团如范德比尔特、卡内基、洛克菲勒等人居然成了“社会主义的真正开路人”,因为照熊彼特看来,正是他们这些“企业家”,“不断革新生产技术”,“创造了资本主义的成就和自动化”,以至不得不使“资本主义自动进入社会主义”。他把这些垄断资本家,说成既是“资本主义的功臣”,又是“社会主义的先驱”,显然是太言过其实了。

(四)

第二个命题:关于“社会主义能否行得通”的问题。

熊彼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指一种制度模式,在这个社会中,对生产资料和生产本身的控制权是授予一个中央当局的,社会的经济事务原则上属于公众,而不属于私人范围(参阅本书第 258 页)。在 1950 年补充到本书里的《大步进入社会主义》一文中,熊彼特又给社会主义下了一个定义。他说:“我把(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的定义规定为:不是由私人占有和经营企业,而是由国家当局控制生产资料、决定怎样生产、生产什么以及谁该得到什么的那种

社会组织”(本书第 25 页)。我们要判断熊彼特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内容,关键问题是要看他所说的“中央政权”或“公共政权”究竟是什么性质。从以上可以看出,熊彼特所说的“中央当局”或“公共权力机关”,仍然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因而他所说的作为社会主义标志的“公有”和“国营”,实际上仍然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国有化和国营,根本没有改变或触动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熊彼特的这种以“公有化”和“国营”为特点的“社会主义”,既然没有触动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它在实质上就只能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熊彼特认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分为三种形式:1. 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2. 不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3. 变法前的社会主义政策。“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表明“所遇到的困难,不仅不是不可克服的,甚至也不是很严重的”。“成熟意味着遇到的抵抗将是微弱的,即将出现所有阶级中大部分人的合作——其征兆之一就是通过宪法修正案的确切可能性,也就是修正案能以和平的不破坏法律连续性的方式通过”(本书第 331 页)。“不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表明这时“在物质与精神上都尚无这样的准备”(本书第 334 页)。“那时局势的一个征兆将是必须使用暴力来反对一些集团和一些阶级(而不是反对一些孤立的个人)的必要性,另一个征兆是不可能修改宪法,即不破坏法律连续性来通过社会主义原则:新秩序必须通过革命,尤其是通过可能是血腥的革命来建立”(本书第 336 页)。关于“变法前的社会主义政策”,熊彼特以英国实行银行、保险、运输、采矿、电力、钢铁、建筑等业的国有化为例,作为采行“社会主义”政策、向“社会主

义”过渡的说明。

在三种形式中,熊彼特极力赞扬并主张所谓“成熟状态下”的和平过渡,也赞同在变法前采行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国有化的所谓“社会主义政策”,而竭力反对所谓“不成熟状态下”的革命转变,把它描述为“极端恐怖的”。他说:成熟状态下和平过渡的社会主义,将“及时实现它的蓝图中所固有的一切卓越成就的可能性是顺理成章的”(本书第 233 页),而国有化的“社会主义政策”,亦可免于各种束缚以及财政上或其它方面的负担(参看本书第 342 页)。总之,熊彼特认为,“在资本主义体系内的逐步社会主义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最明显可以期望的事情”(本书第 339 页)。

(五)

第三个命题:关于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问题。

首先,熊彼特认为:“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了达到政治——立法与行政的——决定而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本书第 358 页)。他接着解释说:“如果把‘决策’和‘统治’等同起来,那么我们才可能得出民主的定义是民治”(本书第 360 页)。他在另一个地方又给“民主”下定义说:“民主的方法”就是“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的方法(本书第 394—395 页)。他还解释说,“民主政治的原则因此仅仅意味着,政府的执政权应交给那些比任何竞选的个人或集团获得更多支持的人”(本书第 399 页)。这里,熊彼特的所谓“由人民作出决定”或“由人民来统治”的民主,当然只能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

其次,熊彼特认为当时在苏联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是“不民主

的”。他说“现存的社会主义可能是民主的真正理想。但社会主义者在实现社会主义时,并不总是那么讲究方法。革命和专政这些字眼出现在圣书中使我们感到刺目”(本书第 349 页)。他又说:“一俟我们检查各社会主义政党的记录时,对它们所说的它们一贯拥护民主信条这句话的真实性就难免要有所怀疑了”(本书第 352 页)。

最后,关于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熊彼特得出的结论是:“在我们所界说的社会主义和我们所界说的民主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两者之中任何一个都能够没有另一个而存在。同时,两者也不是互不相容的:在适当的社会环境状况下,社会主义发动机可以按照民主原则运行”(本书第 414 页)。从熊彼特在本书中所作的分析,我们知道他所界说的社会主义有三种过渡形式,实际上他是指两种社会主义:一种是当时已在苏联实行的社会主义,即他所谓的“在不成熟的状态下”用暴力革命实现的社会主义;另一种是在资产阶级国家宪法允许的范围内逐步加以改良的“社会主义”,即他所谓的“在成熟的状态下”通过修改宪法而和平过渡的“社会主义”,或通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化政策而和平过渡的“社会主义”。熊彼特竭力反对前一种社会主义;而极力主张和赞扬后一种“社会主义”,即实质上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

行文至此,我们还要知道,在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熊彼特向来是以“不成学派的大师”著称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曾经大力推崇熊彼特在解释“熊彼特学派”为什么没有形成时说:“熊彼特的博学、虚怀,以及他的体系的复杂

性,使得难于形成一个熊彼特学派”。^①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不成学派的大师”却是属于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的一大学派,而且是它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事实上,熊彼特无论在理论上或方法上,对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影响都是很大的。特别是美国和日本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的许多头面人物,比如“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又称“新古典综合派”)的保罗·萨缪尔森,被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有所研究的美国进步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Paul M. Sweezy),以及当前位居日本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前列的中山伊智郎、东畑精一、都留重人等,莫不出自熊彼特的门下,受过他的熏陶,并在不同程度上一直传播和宣扬熊彼特的学说和学风。凡是曾经受业于熊彼特的人都认为:熊彼特在讲学和讨论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兼收并蓄”,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但也正因为这样,他通过潜移默化,对他接触过的青年学子的影响就更大。

张培刚

1964年7月原稿,

1978年11月修改,

1996年6月再次修订。

^① 哈伯勒,《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1883—1950年》,美国《经济学季刊》1950年第3期,第307页。

目 录

导论·····	1
初版序言(1942年)·····	9
第二版序言(1946年)·····	12
第三版序言(1949年)·····	17
大步进入社会主义·····	25

第一篇 马克思的学说

前言·····	43
第一章 先知马克思·····	45
第二章 社会学家马克思·····	50
第三章 经济学家马克思·····	66
第四章 导师马克思·····	98

第二篇 资本主义能存在下去吗?

前言·····	119
第五章 总产量的增加率·····	121
第六章 似乎合理的资本主义·····	132
第七章 创造性毁灭的过程·····	144
第八章 垄断的做法·····	151
第九章 禁猎期·····	178

第十章 投资机会的消失·····	183
第十一章 资本主义文化·····	196
第十二章 倒塌中的围墙·····	209
I. 企业家职能的过时·····	209
II. 保护层的毁坏·····	214
III. 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结构的毁坏·····	221
第十三章 日益增长的敌意·····	225
I. 资本主义的社会气氛·····	225
II. 知识分子的社会学·····	228
第十四章 解体·····	243

第三篇 社会主义行得通吗？

第十五章 准备行动·····	257
第十六章 社会主义蓝图·····	265
第十七章 几种蓝图比较·····	285
I. 前言·····	285
II. 讨论比较效率·····	287
III. 社会主义蓝图优越的理由·····	294
第十八章 人的因素·····	302
一个警告·····	302
I. 论据的历史相对性·····	303
II. 关于神人和天使长·····	305
III. 官僚机构管理问题·····	309
IV. 节约和纪律·····	315

V. 社会主义中的权威性纪律;俄国的教训	318
第十九章 过渡	328
I. 识别两个不同的问题	328
II. 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	330
III. 不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	334
IV. 立法前的社会主义政策;英国的事例	340

第四篇 社会主义与民主

第二十章 问题的背景	349
I. 无产阶级专政	349
II. 社会主义政党的记录	352
III. 一次心理实验	357
IV. 探索定义	360
第二十一章 民主政治的古典学说	370
I. 共同福利和人民意志	370
II. 人民意志和个人意志	374
III. 政治中的人性	378
IV. 古典学说存在的理由	390
第二十二章 民主的另一个理论	395
I. 竞争政治领导权	395
II. 应用的原则	400
第二十三章 结论	414
I. 上文分析的几点含义	414
II. 民主方法成功的条件	421

III. 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	430
----------------------	-----

第五篇 各社会主义政党史略

前言	441
第二十四章 未成年期	443
第二十五章 马克思面对的形势	451
第二十六章 从 1875 年到 1914 年	463
I. 英国的发展和费边主义精神	463
II. 一方面是瑞典另一方面是俄罗斯	469
III. 美国的社会主义团体	478
IV. 法国的状况;工团主义分析	485
V. 德国党和修正主义;奥地利社会主义者	492
VI. 第二国际	503
第二十七章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507
I. “大叛变”	507
II.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社会主义政党前途的影响	510
III. 共产主义和俄国成份	515
IV. 管理资本主义?	522
V. 当前的战争和社会主义政党的未来	534
第二十八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	538
I. 英国和正统社会主义	539
II. 美国的经济可能性	544
III. 俄国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	566
人名译名对照表	576

在熊彼特的心目中,资本主义将被它的经济成功而不是被它的经济失败杀死,因为这些成功造成一种不利的社会与政治气候,或者如他所说,造成一种“几乎普遍地仇恨它自己的社会秩序的气氛”。

在产生这种反资本主义看法中有三个过程是重要的。第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本身破坏熊彼特认为是资本主义基本特征的创业或创新的机能,因为大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官僚式经营往往使创新成为日常例行的事情,并以专家委员会和专家小组的活动代替个人的创造性。第二,资本主义毁坏从先前社会形式存活下来的保护层——士绅、小工商业者、农民和其他阶层——并削弱个人所有权来支持现代公司中那种较分散的所有制,从而侵蚀了它自己的制度基础。第三,资本主义鼓励一种理性的和批判的心态,它最终反过来反对自己的社会制度,它造就巨大的知识分子阶层,由此大大支持了这个过程,据熊彼特看来,知识分子“在社会动乱中有既定利益”。

20世纪30年代末以后时期所发生的事件,为熊彼特的论点提供了一些支持。毫无疑问是战争使资本主义有可能从衰退中开始恢复,但在它战后的发展中,并没有什么停滞或迫在眉睫的崩溃的迹象。即使70年代中期的衰退,现在也开始表明只是暂时性的挫折,整个战后时期,经济增长速度特别快。这种增长在50年代和60年代是如此明显,当时“富裕社会”的理论日渐普及,以致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激进批评往往从经济分析移向文化批评,这样的转变,在马库塞的著作中和在60年代后期激进运动的思想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就在这段时间,“文化革命”和“反文化”的理论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在当时激进运动中知识分子发挥的很大一部分

在熊彼特的心目中,资本主义将被它的经济成功而不是被它的经济失败杀死,因为这些成功造成一种不利的社会与政治气候,或者如他所说,造成一种“几乎普遍地仇恨它自己的社会秩序的气氛”。

在产生这种反资本主义看法中有三个过程是重要的。第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本身破坏熊彼特认为是资本主义基本特征的创业或创新的机能,因为大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官僚式经营往往使创新成为日常例行的事情,并以专家委员会和专家小组的活动代替个人的创造性。第二,资本主义毁坏从先前社会形式存活下来的保护层——士绅、小工商业者、农民和其他阶层——并削弱个人所有权来支持现代公司中那种较分散的所有制,从而侵蚀了它自己的制度基础。第三,资本主义鼓励一种理性的和批判的心态,它最终反过来反对自己的社会制度,它造就巨大的知识分子阶层,由此大大支持了这个过程,据熊彼特看来,知识分子“在社会动乱中有既定利益”。

20世纪30年代末以后时期所发生的事件,为熊彼特的论点提供了一些支持。毫无疑问是战争使资本主义有可能从衰退中开始恢复,但在它战后的发展中,并没有什么停滞或迫在眉睫的崩溃的迹象。即使70年代中期的衰退,现在也开始表明只是暂时性的挫折,整个战后时期,经济增长速度特别快。这种增长在50年代和60年代是如此明显,当时“富裕社会”的理论日渐普及,以致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激进批评往往从经济分析移向文化批评,这样的转变,在马库塞的著作中和在60年代后期激进运动的思想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就在这段时间,“文化革命”和“反文化”的理论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在当时激进运动中知识分子发挥的很大一部分

作用可以认为与熊彼特所说的资本主义衰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好一致。

但还有某些重要的差异。以往 10 年里的许多激进批评,并未使资产阶级理性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而是更倾向于向任何形式的高度有组织的工业社会(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中科学和技术思想所体现的理性主义观点的思想意识优势地位挑战。这个行动并未扩散开来形成普遍反对资本主义,而往往把从事文化批评的知识分子阶层和大部分主要关心经济增长因而关心进一步发展和使用科学技术的大部分人区分开。从这个方面说,可以这样认为,普遍敌视资本主义的思想并没像熊彼特想象的那样增长和扩展,而是主要被较快经济发展所遏制,也就是说,被新的经济“成功”所遏制。

而且战后的趋势、尤其是近些年的趋势,对熊彼特的分析提出某些其他怀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继续存在依靠创新和扩展,可以这样说,在为了保护自然资源必须限制经济增长率的条件下(包括限制人口增长和使用能源等),这样的扩展很可能越来越困难。在这些考虑之外,还可以加上对继续以过去几十年获得的速度进行技术创新的可能性,和出现过去由铁路随后由汽车发展所提供的那种规模新投资机会的可能性的疑问。熊彼特论述了一些这样的问题,但与现在发生的状况十分不同,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前景的看法,甚至他对他关心的大约 40 年的中期未来前景的看法,可能显得过分乐观了。

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的衰落(不管如何发生)并不招致社会主义社会的出现,而熊彼特认为社会主义是“很可能的继承人”的观

点是以这样的论点为根据的,大意是经济过程倾向于使本身社会化。他进行分析的现代社会发展体系有三个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进取的资本主义、有组织的或官僚结构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的过渡是作为经济变化的后果来到的,在这些变化中最重要的是那些创建以现代科学和合理管理为基础的大实业公司的那些变化。应该注意,熊彼特为社会主义下的定义只是作为一种经济制度,“一种由中央当局控制生产手段和生产本身的制度模式……或者说,原则上社会经济事务属于公有范畴不属于私有范畴”。他在论述中把社会主义的文化目标搁置一旁,以带几分骑士的风度谈到他称之为“社会主义文化不确定性”的东西。结果是,在他的分析中从不思考社会主义是一场阶级运动,它要求消灭和缩小阶级差别,从而获得更大的社会平等,把人民群众从统治阶级强加的抑制中解放出来。熊彼特只关心社会的经济改革,而当他查究社会主义能否发挥良好作用时:他的意思是指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是否有效率和能否增加生产。

这样看待社会主义运动是非常狭隘的观点,也是夸大社会主义文化多样性的观点。现代社会主义尽管形式多样,可以肯定的是,它们集中关心的是与社会平等和个人自主与自决有关的问题。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者中很少有人把社会主义等同于中央集权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或者更广泛地说,把社会主义只想象为一种生产模式。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说出社会主义的特性,较适当的是指出它是一场人类解放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经济制度改造只是一个要素,它本身使建设不同类型的社会制度有多种多样的选择。

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的论述也有点儿狭隘。

在用经济术语为社会主义下定义同时,他为民主下了个经济性质的定义,把它想象为类似市场的制度安排。在那样的民主中,不同的集团和个人——相当于企业和企业家——争取选举人,即政治“消费者”的选票。熊彼特特别强调经济与政治组织之间的这种相似性,为了说明这点,他援引一位政界人士的话,大意是“生意人不懂的东西恰恰就是他们做石油生意而我做选票生意”。这个仅仅是选举政治领导人的方法的民主理论(马克斯·韦伯在他后期政治著作中已经表示过这个想法)是作为替代熊彼特反对的“经典理论”的理论提出来的,根据经典理论,民主包括关于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和关于政治领袖与人民之间关系的性质的特定政治理想。

熊彼特并非总是十分严格地坚持他自己的概念,这一点是确实的,他在论述资本主义形成和现代民主出现之间的历史性联系甚至偶然关连时,他介绍的理性行动、个人责任心、自我约束、容忍等等思想,看来更确切地是属于经典理论。可是,把民主看作争取政治领导权,看作是对任何社会或政治目标没有明确实质的一种形式的观念依然处于中心地位;这种情况使熊彼特不考虑民主是一种历史现象,这个现象可以出现发展和扩大的趋势,也会出现停滞和衰退的倾向。熊彼特提到民主时,只把它作为一种机械,指出它“可行”或“不可行”,它的机能较好或较坏;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似乎没有办法检验一个社会的民主是较多还是较少的问题。

但正是这个民主扩大问题是整个上一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理论和实践发展中的根本要素,并在近些年来的“分享民主制”思想中找到新的表达。这个世纪的全部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均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旨在建立一个更民主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大部

分人(尤其是迄今被排斥的人)将在以各种规模作出影响他们生活的决定中发挥更加直接和更为有效的作用,不管在工作单位、家庭和当地社区,或者在全国和国际范围都是一样。要这样扩大民主的困难现在已非常明显,那些社会主义社会的困难也一样多,在那里,经济落后、专制统治的传统、缺少先前的自由民主形式和单一政党的统治全都反对建立在社会生活各方面保证由人民真正自治的制度。

情况也可能是这样,如熊彼特提出的——后来许多批评社会主义的人追随使用他这个论据——中央集权的经济计划实际上有害于民主参与,往往产生权力完全集中在政治领导人和计划制订者手中,不管这些人选择任何手段。但这里,熊彼特在市场经济和中央集权社会主义之间(用近期作家的话说是市场经济和指令经济之间)所划的界线太刻板了。完全不允许有任何选择或替代。因为在大体上由中央计划的经济可能在决策中依然有相当程度的权力分散。此种权力分散的一个特色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所以许多领域的经济生活的决定可能是由许多不同的活动中心作出的,而不是一律由上级布置的。在最近 10 年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此类发展以及遵循这个方向的某些实际经济改革,已经有过许多讨论。

权力分散的另一方面,熊彼特在简短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社会化委员会时几乎只字不提,它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中个人企业的生产组织问题。这里也有各种不同的选择,包括由上级或多或少全盘的独裁控制到南斯拉夫模式的自治管理制度。尽管南斯拉夫制度遇到了各种问题,在我看来,它构成公有企业可以存在

的有前途的形式,代表 20 世纪为扩大民主参与社会生活最有意义的贡献之一。自治管理的思想近些年来影响越来越大,不论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工运动中都是这样,看来有可能,关于社会主义与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的争论将逐渐以这些条件以及关于现在已经可行的工人自我管理生产的历史经验为准则。

考虑到它的所有局限性,熊彼特把民主视作选择政治领导人方法的观念中还有任何巨大价值的东西吗?也许它最重要的特色(虽然这点不为熊彼特重视)是包含在其中的异议和反对的思想。竞选政治领导权使那些对他们在社会中所处地位不满或对社会政策总方向不满的集团有可能表达他们的批评意见和对那些眼下的政治领导人施加某种影响。但这仍旧不是保证社会可以接受批评和改革以及政策的决定不是用独断方式作出或不是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的唯一重要手段。对于一个完全民主社会有效运作来说,至少有另外两件事是极端重要的:第一,要有尽可能多的公民参与决策,也就是说,他们应该有机会和经验在各种领域为他们生活的某部分行使政治领导权;第二,应当有各种各样的相对自治社团(包括国有工商企业),在这些社团里可以实行这种自治管理办法,它们为对社会安排的持久而不受阻止的批评与改革提供基础。

熊彼特此书刚问世时获得的成功和它对读者持久的吸引力,我想可以用如下事实来解释:它对当代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社会过渡时期进行了认真和全面的检验(并把有启发性的对马克思理论的批判性赞扬放在全书开端,作为对值得注意的过渡时间的唯一社会主义分析),而不是因为书中对这个社会改革过程

所作的那种性质的评价。熊彼特完全不欢迎社会主义的到来,他似乎和马克斯·韦伯一样,以同样阴郁的忧虑心情对这个问题作过沉思。但这个态度并不阻止他尽可能仔细和平心静气地分析那些使社会主义可能出现的趋势,而这种分析可能加强了他对某些形式社会主义出现的困难和危险的认识,社会主义思想家本身在经过多次受骗之后现在能够更容易地意识到这些困难和危险。

汤姆·博托默尔

布赖顿, 1976年

初版序言(1942年)

本书是把几乎40年来我对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的大量思考、观察和研究写成一本易读读物的努力的结果。民主问题之所以硬挤进它目前在本书中所占的位置,是因为要陈述我对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与政府的民主方法之间关系的看法,要这样做不对后者作相当广泛的分析、证明是不可能的。

我的工作比我所想的还要困难。部分必须整理的性质迥异的材料,反映出一个人的观点和经验,他在他生活的不同阶段具有非社会主义者通常具有的较多的观察机会,他以非传统的方式对观察到的事物作出反应。我不希望抹掉这种痕迹。如果我试图去掉它们,那么本书应有的那种趣味,许多就会消失。

再者,这份材料也反映出一个人的分析努力,他虽然始终认真地试图探索表象下面的真相,但从不把社会主义问题作为他任何一段时间专业研究的重要主题,因此对某些主题比别的主题有多得多的话要说。为避免造成我旨在写出一本处处均衡的专题著作的印象,我想最好把我的材料分辑在5个中心题目之下。它们之间的连接和联系,当然已经准备就绪,我希望大致上已经达到表述上的系统统一。但在本质上,这些题目——虽然不是独立的——几乎是自成篇幅的几篇分析文章。

第一篇以非技术性的写法,概述了我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这个

主题一定要说的意见——事实上也是我已经教授了几十年的见解。以对这个真理的说明作为讨论社会主义一些主要问题的开端,是马克思主义者做事的自然次序。但在由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建造的房屋的门厅内作这样的说明的目的是什么呢?它在那儿证明我这个非社会主义者相信马克思主义道理具有的独特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完全与你接受它或拒绝它无关。但它读起来很困难。此后各篇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工具,虽然此后各篇的一些结论还要一再和这位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的教义作比较,对马克思主义不感兴趣的读者因此可以从第二篇读起。

在第二篇——“资本主义能存在下去吗?”——中,我试图说明,社会主义形式的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同样从同样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瓦解中出现。许多读者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为了得出正在迅速变成甚至在保守主义者中间也是普遍意见的结论,我却认为必须作那么吃力和复杂的分析。理由是,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同意这个结论,但是对于正在杀死资本主义的这个过程的性质以及对于“不可避免”这个词的精确意义,我们的意见是有分歧的。我相信已提出的大多数论点——不论是关于马克思主义还是关于较通俗的理论——都是错误的,我觉得我有责任不怕相当麻烦,不怕打搅读者,以便有效地引导大家理解我这个似非而是的结论:资本主义正在被它的成就所消灭。

明白了——我想我们都会明白——社会主义是一个实践命题,由于当前这场战争的后果,它可能变成立即实践的命题,所以我们在第三篇——“社会主义行得通吗?”——里将考察有关可望社会主义秩序成为经济成功条件的许多问题。这一篇为包括“过

渡”问题在内的各种不同主题作了最接近均衡的论述。爱和憎严重地模糊了迄今对这个问题所作的认真研究的结论——这种研究并不很多——以致即使只是重述被广泛接受的观点,看来到处都证明是有道理的。

第四篇——“社会主义与民主”——是论述已在美国进行了一段时间论战的文章。但应该注意,这一篇只论述原则问题。有关这个主题的事实和评论,分布于全书各处,尤其是在第三篇和第五篇中。

第五篇如它意欲做到的,是一个梗概。我希望在这一篇中比在其他各篇更严格地限定自己,只阐明根据我个人观察和极零星的研究得到的必须说出的意见。因此,编入这一篇的材料无疑是令人遗憾的不完整,但在那里的材料都是生动的。

本书的任何章节都从未出版过。但是有关第二篇论点的一份早期草稿,曾成为1936年1月18日在美国农业部研究院演讲的基础,由该院油印成册。承院务委员会主席A. C. 爱德华兹先生允许,我将它的增订本收入本书,特表感谢。

第二版序言(1946年)

这一版除增加新的一章外,不作任何变动地重印了1942年的原书。我为什么在清楚地应该作文字改动的好些地方保留原状的理由是:这本书中论述的问题,改变文字而不改变意思是不可能的,或者至少会引起意思改变了的怀疑。我确认下面事实有一定重要性:不论是过去4年发生的事实,还是评论文章中提到的批评,都没有影响我对形势的诊断和预测,正相反,在我看来,这些业已出现的新事完全证实了我的诊断和预测。新增加的一章的唯一目的是,以这些新的事实来增强旧版本中,尤其是第19章第4节和第27章第5节中所论述的某些论点,并表明目前形势如何符合本书已略述大概的历史哲学。在这个序言中,我准备谈谈某些针对本书所作的(不一定在书刊上发表的)批评,或者说某些批评的代表。但我想这么做的目的是,我希望我必须提出的答复可能证明对读者有些用处,并不是因为我从本书所受的待遇中挑剔毛病。正相反,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向本书的评论者表达我永恒的亲切和好意,并向它的7种外国语译者的大量的努力,表示我诚挚的感谢。

首先,让我谈谈两个专业性质的批评。一位有国际声誉的杰出经济学家表示不同意我下列的命题:本书指述的作为社会过程的一部分,利润有消失的长期趋势。他说,销售努力总将博得它的